

纪念著名哲学家布尔迪厄、诺齐克、伽达默尔当代杰出的社会哲学家布尔迪厄
——罗伊克·瓦克昆特谈皮埃尔·布尔迪厄的影响及他最后从事的研究

[美]S. 麦克莱米 / 文 梁虹 / 译

一代思想大师、法国知识界的领袖人物之一皮埃尔·布尔迪厄因患癌症于2002年1月23日在巴黎溘然长逝。布尔迪厄先生任法兰西学院教授，是同代人中最杰出的社会学家之一。他试图运用“习性”和“文化资本”模式解释等级体系与宗主地位关系是如何在构成社会的各种“场域”中进行再生产的。

在美国，他的《区分：对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一书深为学者们所熟知。而同时，他的反自由市场政策的论述又为他在这一赢得了广泛的普通读者群，这些论述多数被收到《抵抗行为》一书中。在他的《知识分子》(Homo Academicus)及其它的一些作品中，布尔迪厄先生将他的社会学方法运用于对知识分子的分析上，描述鲜有吹捧奉承之意。在他的统计图表和晦涩的文章背后，布尔迪厄先生似乎有意(做的并不够好)隐藏他的讽刺家的天分。

罗伊克·瓦克昆特(Loïc Wacquant)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社会学教授，他与布尔迪厄先生合著了《反观社会学之邀请》一书。布尔迪厄先生逝世后的一天，当时正在巴黎的罗伊克·瓦克昆特先生在一次电话采访中讲述了这位思想家的生活、工作及他留给世人的宝贵财富。

问：对美国人来说，很难理解布尔迪厄在法国的影响力。有时人们把他比做让·保罗·萨特，虽然这种比较并不十分恰当，但布尔迪厄近年的确占据着绝对的中心地位。请您描述一下他的影响力好吗？

答：国家主要日报《世界报》为了将他逝世的消息登上头版而推迟了发行时间，总理以及左翼各党派也纷纷表示哀悼。他曾热衷于将他的科学研究成果(社会学方面)用于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过去的七、八年间，在法国以及整个欧洲，尤其是在德国，他一直是那些积极参与公开辩论的知名人士之一。他在德国的知名度甚至高于在法国。他公开反对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空想世界观——市场决定一切。他将他的分析运用于科学、艺术、媒介、教育等领域，试图说明保护这些领域的必要性，因为他认为，即将到来的商品社会必会带来破坏性的、违背民主的后果。他试图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独立思考的武器以及某种批判性工具，使人们能够运用它穿透一脉相承的思想与话语的硬壳，这样人们就可以共同参与到具有启蒙意义的民众讨论中来。他一直致力于研究理性与科学以及二者在当代社会应充当

的角色等论题，我认为，他可以称得上是新的启蒙运动的倡导者。

问：您对布尔迪厄工作的描述与他的立场一致，他也一贯坚持他所从事的不是哲学，而是社会科学活动。您如何看待他严谨的科学理性与他在90年代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呢？

答：那只不过是形式上有所不同，而根本内容从未发生过变化。他早期曾写过一本著作，内容是关于阿尔及利亚的小农阶级在殖民主义、市场及民族主义战争中的变迁(20世纪60年代出版)。如果你现在去回顾这些问题，可能不会觉得它有那么严重。但如果你去读这本著作，就会发现作者对那个社会的变迁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辟入里的分析。从一开始，他就用最淡漠的、最系统化的方法来重新讲述当时最引起轰动、最严重的事件，你还可以在他后来关于教育的著作中看到这种手法。1968年5月，示威的人群站在路障旁，手里拿的就是他的著作《继承者》(对法国学生生活的分析)。他在这本书中对教育体制改革的不留情面的分析使人们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和他们所置身的社会。而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变化只是他著作中描述的市民特性的外在表现。他能够敏锐地感觉到我们正生活在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在这个时期，有许多关于社会公正和社会保护的制度(主要体现在福利国家)会在几年内遭到破坏。他开始用一种不同的风格，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来写作，以试图对民众关于退休基金、媒体、教育等的争论产生影响。

问：我们并非一定要将他的思想与他的经历联系起来，但他既具有冷静的理性，同时又具有政治热情，这与他的某些个人因素有关吗？

答：布尔迪厄有一段不平凡的社会历程。他来自一个农民家庭，他的家乡是一个遥远而偏僻的村庄，你很难想象它离知识权利中心有多么远。他操着浓重的法国南部口音。在家人中，他是第一个完成高中学业的人，而后来他在教育体制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早期理想是成为一

名哲学家，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第二个萨特，但他的背景和他对学术界的不适应，使他感到很不如意。令他转变的决定性因素是阿尔及利亚战争，这场战争使他远离了哲学，远离了自我封闭的心灵世界，到达了社会学这样一个与实证研究密切结合的学科。社会学所要求的是系统地参与到世界中去——计算、观察、面对面交流，而不是像哲学家那样游离于现实世界之上。你要知道，在60年代的法国，社会学是一门毫无生气的学科，是遭社会遗弃的学科。从一名哲学家到一名社会科学的研究人员意味着社会地位的降低，但他仍决定致力于将科学应用于社会。而他既精通传统哲学思想，又掌握实地考察和数据分析的方法，这一点足以使他脱颖而出。

问：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子进行的社会学分析是他著述的一个重要内容，这部分内容的确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答：对他来说，分析知识分子生活中的癖性与不足是完全有必要的。你或许认为，以某一特定方式进行思维是由你的职业兴趣、你的喜好以及你在某个学科的地位等等决定的——如果你被这些偏见所蒙蔽，如果你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决定了你的思维，你又怎么能对事物进行冷静客观的分析呢？他的这一著述引来诸多争议，他受到某些同行们的严厉驳斥，因为他们不愿意被置于显微镜下进行分析。他要求知识分子独立、严谨，要有自己的立场，并坚持知识分子应把他们的研究成果带回到社会中来，这样做应是出于知识分子的严谨态度，而非出于树立个人名望或是引来媒体关注的目的。

问：在布尔迪厄工作的后期，他一直在从事哪些研究？

答：他在许多新的研究计划实施的中途离开了我们，这或许是再悲痛不过的事了。数月前，他刚刚在法国出版了《科学与反观性之科学——对科学领域的社会学分析》(The Science of Science and Reflexivity—a soci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world of science)一书，该书对过去约十年间甚为繁荣的整个“科学研究”领域进行了近乎刻薄的批判。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三本书会在未来几周内面世。第一本书是他的政治著述的纲要，约500页左右，名为《干预1961—2001》(Interventions 1961—2001)；第二本书恰好是他的著述的书目，其中包括45本书和500篇论文；还有一本是布尔迪厄患病前刚刚完成的，名为《单身汉们的舞会》(The Ball of the Bachelors)，这是以他老家的村庄为背景的人种学的系列论文。该书一开始以生动的笔法描绘于某个周五举行的晚会，在这个晚会上，他注意到所有的男子们都站立一旁，不去跳舞，因为他们“未到适婚年龄”。他从这样一个极为平常的事例出发，对婚姻关系、家庭变化和农民的符号象征意义的贬值等等进行分析。书中的那些男子曾经是他的邻居或是同他一起长大的朋友。这本书写得很美，读来很亲切，而同时它也是在人种学方面进行的一次杰出研究。

问：读者还能读到他去逝后出版的其它作品吗？

答：他有一本未完成的有关莫奈的遗作，已经写了几年了。他认为，莫奈的绘画带给艺术世界的革命与福楼拜在文学领域的表现不无相同之处。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布尔迪厄的话题，因为他在社会科学领域所做的与莫奈及福楼拜在他们各自领域所做的如出一辙。我想我们还得花30至50年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他的著述的真正含义。

(Scott McLemee, "Loic Wacquant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Pierre Bourdieu, Who Died on Wednesday and His Last Projects," 原载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January 25, 2002, 责任编辑：张小简)

[回主页](#)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哲学所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010)8519507 传真：(010)65137826